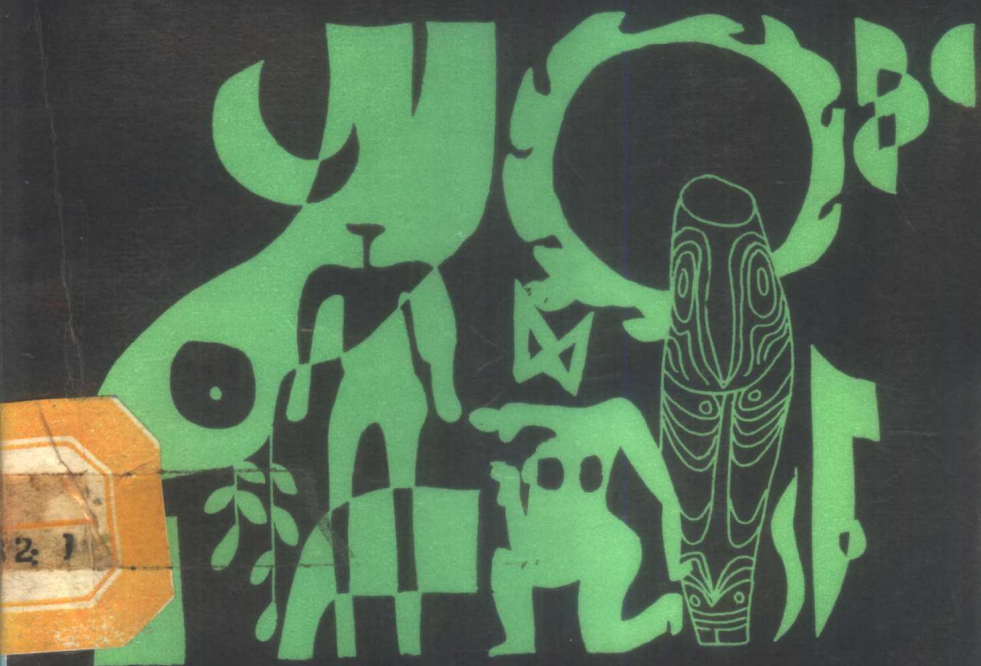


开放丛书·思想文化系列

刘述先 著

文化哲学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文化哲学

刘述先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年·哈尔滨

文化哲学

刘述先 著

责任编辑：王晓明

封面设计：李欣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沈阳市第六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6.375·插页2·字数135千

1988年12月第1版·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16-0363-2/G·315 定价：2.20元

作者介绍

刘述先，有时也用笔名言衍，1934年生于上海，原籍江西吉安。195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哲学系，1958年获硕士学位，1966年获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东海大学副教授，南伊利诺斯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主讲西洋哲学史、文化哲学、宋明儒学等课程。著有：《文学欣赏的灵魂》、《语意学与真理》、《新时代哲学的信念与方法》、《文化哲学》、《生命情调的抉择》、《中国哲学与现代化》、《马尔劳与中国》、《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熊十力与刘静窗论学书简》诸书，并译有卡西勒《论人》等现代西方哲学著作。

序 言

文化哲学是一个新兴的领域，迄今还没有一定的规模。我一向留意于这方面的问题，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反省，近年来又有机会在南伊利诺斯大学哲学系讲授这方面的课程，所以我愿意就这个题目提出一点个人意见。

首先，我们来讨论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围。文化哲学的内容有许多和历史哲学重合之处，但是二者的目标和重点不同，所以不能混为一谈。历史哲学的主要目标是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即究竟人类历史的行程走的是一条直线的进程？还是往复的循环？或者是螺旋形的进化？到底有没有一定的规律可以遵循？甚或是非理性的盲动？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来搜集和引证有关各种文化的事实，它并不以文化研究本身为对象，只是以它们为实际例证，来探求究竟有没有关于历史进程的普遍规律。而文化哲学的主要目标则在于探讨人类文化所呈现的事实，观察各种文化所表现形态的异同，并进一步探求究竟有没有普遍适用于人类文化的规律、价值或理想。既然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的历史，所以不能不引用已建立的史实来审查各种文化开展的方式，这就是二者间密切关系之所在。大体上历史哲学的观点在纵贯，而文化哲学的观点在横列，彼此互为宾主。历史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定命抑或不定

命，文化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则在于是相对主义还是绝对主义。本书所论斯宾格勒的系统就是在历史哲学的架构中蕴含着一套文化哲学架构。研究文化哲学离不开比较的观点，这可以说是它的最明显的特色。

在我们讨论文化哲学的时候，同讨论历史哲学的情形相同，不能够不了解英美的学风与欧洲大陆学风的差别。概括地说欧洲大陆的学风重体系的建立，往往不满足单纯的搜集经验事实，而务求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而英美的学风则取实证怀疑的态度，不相信在经验科学求实证的方法以外还有任何特殊的求学问的方法。就一般哲学风气而言，二者态度的基本差异则反映在欧洲大陆的存在主义与现象学和英美分析哲学的不同潮流上。英美方面在文化哲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对文化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分析，以及对于考古学暨文化人类学所采取的假定的批评。虽然有时也有少数学者产生建立体系的野心，如当代社会学巨擘帕森斯(Talcot parsons)之流。今日欧洲大陆虽然也与英美一样有强烈的反形而上学的风气，但却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理由。存在主义者如萨特主张“存在先于本质”，否定有所谓固定的人性，而以“自由”为意识的基本构造。萨特在其巨著《存在与虚无》中所阐述的一整套观点，决不能用经验归纳法建立起来。他的学说与康德、黑格尔的渊源关系至为明显。现象学的大宗师胡塞尔与存在主义的开山祖之一海德格尔都拒绝接受经验科学的方法可以把握深刻真理的观点。但是欧洲大陆的思想如现象学的后期发展也越来越避开形而上学的假设，虽然其学风与英美仍有莫大的距离，但却有了彼此接近的趋势。

我们现在必须暂时斩断这些复杂理论的缠绕。最低限度

我们可以说，古典式的经验主义的概念与方法是完全过时了。今天再没有人象洛克那样由单纯观念出发，或者象休谟那样由特殊的感受印象出发了。心理学上的“格式塔”（Gestalt）与社会人类学上的“罗聚形态”（Configuration）已经成为常识的观念，对事实的记述往往已牵涉到对事实的解释，在理论假说方面的进步常常会帮助我们发现新的事实。诺思罗普（F.S.C. Northrop）提出所谓“假定的方法”（The postulational method），既不是单纯的归纳，也不是单纯的演绎，而是二者之间的综合。任何理论的建立决不能缺乏一些先行的假定（presupposition）。由此可见，英美在偏重事实经验成分的气氛之下，也知道系统理论成分的必要性。某一种低限度的统观在经验科学的范围之内也是不可缺乏的。当然，今天我们已经充分了解了知识的非绝对性，任何假定都可以作进一步的修正，但这决不是不要我们提出假定和理论的统观。因此，针对今日支离的学风，我愿意强调哲学必须提出关于全盘宇宙、人生以及人类文化成就的图象，虽然我也坚决地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对于不可知本体的臆断。其次，现代的学风往往企图逃避价值的判断，但我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反独断的态度固然是好的，但过分的怀疑与游移会令人对人性完全丧失信心。价值的极端相对主义的看法竟然使得人们完全无法辨别善恶，这也正是现代人类文化所遭逢的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人所作的价值当然无法保证不犯任何错误，但这决不证明在文化发展到某一阶段时不能够发现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或真理。一种理论分化为不同的理论，这是我们可以超越极端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的唯一正确的出路。

就个人的气质来说，我虽然浸润在英美的学风之中，却反而更接近于欧洲大陆的哲学心态。当然，我最大的梦想是能够辨别出中国文化中活着与死去的部分，重建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使其具备现代意义，能够针对现代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透彻的批评，从中发展出一整套哲学观念以应付人类在当前所遭遇的难题。

当然在这一部书中，我无法实现梦想于万一，但是我却可以检验文化哲学所必须越过的两块里程碑，即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与卡西勒（Ernst Cassirer）的两个文化哲学系统。斯宾格勒的思想既富智慧也多乖谬之处。他的历史定命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是没有理论根据的。但他在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上却是打开了一条全新的进路。卡西勒以其符号形式哲学的观念研究人类文化的各种形式，在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文化形式中找到统一形成的原理，把人类文化的历程当作人类不断追求自由解放目标的实现过程，这样的进路是我所衷心赞许的。但是，他把科学的价值隐隐约约放在艺术、宗教与历史之上的观点，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在本书的前两章里，我先把这两家的学说系统地加以介绍，而后再作出批评。虽然在这两章里我并未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但却通过这两家的学说，提出了对于有关东西文化和人类文化各种形式的反省，这两大问题是文化哲学必须面对的两个最中心的问题。在第三章中，我提出了世界未来文化哲学理论的建构，虽然也许失之过简，但其中心思想与我在几年前出版的《新时代哲学的信念与方法》（商务人人文库）中所发挥的观点互相呼应，要作更进一步的探研还有待于未来的努力，但是这两部书已经多少指出了

大概的方向。

应该声明的是，第一章关于斯宾格勒的文化哲学观曾发表于香港民主评论杂志与东海学报。第二章关于卡西勒的文化哲学观曾发表于香港人生杂志与民主评论杂志。第三章关于未来文化哲学的建构方向曾发表于人生杂志。

在这些年的沉浮中，我曾经历过许多怀疑与绝望的时刻。总觉得凌空的议论，无补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但回顾历史，高远的理想每每不免于蒙尘涂炭。所以，现实的不合乎理想并不能够否定高远理想的真实性。而这一代年青人反唯物与理想主义之情操所表现的虽不免于扭曲，却不失为一次转变世界局势的机遇。由此更可激发出一种百折不回的刚健奋发的精神。如果没有健全的哲学文化理想为主导，不只国内外现实政治经济社会的问题纷乱如麻无法解决，既使是个人也将被挤压在现实的夹缝之中而不免于疏离，丧失自己清明反省的心灵与创造建设的能力。因此，只有超脱出来，又关心进去，潜心于艰苦卓绝的理论工作，为民族文化理想保存一丝元气并播撒一些未来的种子，这就是我个人最深切的期望。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斯宾格勒的文化哲学观	(1)
第一节 导言	(1)
第二节 斯宾格勒论历史形态学与自然形态学的区别	(5)
第三节 斯宾格勒论历史文化形态的差异	(21)
第四节 斯宾格勒论历史文化形态的相同	(37)
第五节 理论归结：斯宾格勒的现实主义	(55)
第六节 斯宾格勒历史形态学的成就和缺陷	(62)
第二章 卡西勒的文化哲学观	(87)
第一节 引言	(87)
第二节 卡西勒符号形式哲学的一般思路	(88)
第三节 卡西勒论“语言”的文化形式	(114)
第四节 卡西勒论“神话”与“宗教”的文化形式	(124)

第五节	卡西勒论“科学”的文化形式·····	(134)
第六节	卡西勒论“艺术”的文化形式·····	(146)
第七节	卡西勒论“历史”的文化形式·····	(154)
第八节	卡西勒文化哲学的理论归结·····	(160)
第九节	卡西勒符号形式哲学的批评·····	(164)
第三章	未来文化哲学理论建构的方向·····	(180)

第一章 斯宾格勒的文化哲学观

第一节 导 言

1918年，一位默默无闻的德国中学教员（Oberlehrer）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突然出版了一部题名为《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英译 The Decline of the west）的巨著的第一卷；再隔四年以后，1922年，这部大著的第二卷也应时降生到这个闹嚷多事的世界场中来了。这书计划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完成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经出版，立刻成为世界上有数的哲学畅销书之一。依据索罗金（P. A. Sorokin）的观察：“不到数年功夫，这部书便卖了九万多册，引来了繁多的文献，并且被翻译成数种语言。《西方的没落》被证明为二十世纪前半世纪中社会科学、历史哲学与德意志哲学的一部最有影响力、争论最多、也最能持久的大作。它使一位籍籍无名的中学教师立刻跻身于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之列。”

但是，“什么是这空前成功的理由？什么是这部书注向于它的读者的魔力？”另一位当代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卡西勒发表了自己的观感，他说：“我想，斯宾格勒成功的原因，宁在其题目，而不在其内容。《西方的没落》这题目是个电火花，点燃了他的读者们的幻想而发出火焰。这书出版于

1918年6月，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端。在这个时间里，我们的受到高度赞美的西方文明中，有些事物腐烂了。斯宾格勒的书，在尖锐得当的方式下，表现了这样一个一般性的不安。它根本不是一部科学的书。斯宾格勒鄙视并公开向一切科学方法挑战。……他自诩发现了一个新方法，依之，历史和文化的历史事件，能在同样方式下，具有同样的精确性，正象一个天文学家预知一次日蚀或月蚀一样地可以预断。……依斯宾格勒，文明的兴起、下降与坠落，并不靠所谓的自然规律。……是命运而非因果，这才是人类历史的动力。……”^①

卡西勒的这些话，可以说给予了斯宾格勒的书及其庞大的影响一个清楚明确的指示线索。是现代这一支自诩进步的西方文化突然面临了空前未有的浩劫危机，使他们不能不由内心醒觉“西方是否没落？”这个沉重的大问题，而开始震惊于斯宾格勒发出的悲壮呼声！也是今日内心悽伤战栗、饱受现代战争祸害与心灵疾病侵袭的人类，亟望知道世界未来的命运所做的一种最后的努力，使他们发狂地吞食下斯宾格勒为他们准备的许多动人心魄的描述与结论！难道这近二、三百年来光辉灿烂不可一世的西方文化，竟也不能免于灭亡的命运，最后终将毁于一旦？而这样的疑问背后假定的心态，已经足够为《西方的没落》一书在现实中流行畅销的事实，找到最自然而且合理的解释了。

然而，现代的人们，对这样一部外表名著的内容，究竟有多少真切的认识与了解呢？这却是全然不同的另一回事

^① 见拙译卡西勒《国家之神话》最后一章《现代政治神话之技术》，载香港民主评论八卷第十三、十四期，请予参阅。

了。斯宾格勒的书，当作一部纯学术性的名著来研读，是一部极不容易领会的书。传闻本易失实，而口号引起的情，与潜心钻研得到的结果，更有着相当的距离。十年之间，耳闻目拾，我也曾一鳞半爪地得到不少有关斯宾格勒历史形态学的知识，但同时也接受了许多错误的观念与印象，一直到最近自己亲身读到这部书的原著英译本以后，才修正与澄清了一些我已经习以为常的谬误观点。

既使在这样的情形下，想要对斯宾格勒的许多中心概念作一番全盘的详尽如实的描述，依然是一件极端困难的工作。一则斯宾格勒的这部书，实在是一部卷帙浩繁、内容异常丰富的大书，不仅意旨深远，而且累积了无数历史经验论据，而世间极少学者能够同时精通熟悉斯宾格勒所涉及的历史与学问两方面所牵连的广大丰富的内容。二则也正因为斯宾格勒选择了这样一种往宽广方面多方搜罗证据以印证他的基本论题的写作方法的缘故，致使读者反而容易迷失在他所提供的巨大的材料海洋中而失落了方向，使自己无法对斯宾格勒的学说，产生出一种全盘的一般性的认识。不错，从某方面说，斯宾格勒的论说的确是一副彻头彻尾的连环套，他的思想自始至终都是自圆的。但可惜的是，他自己并不曾为我们解开这个连环套。片断材料与局部意念的零碎展出，使人对他的中心观念，只能获得一种杂碎零乱的印象。由于斯宾格勒本人不曾为我们一次即集中地提出他心目中内蕴的一套历史形态学的基本理论架局，这使介绍他的学说的人们面临了一个最感困扰的难题。^①三则斯宾格勒对文化的许多领域，诸如艺术、哲学、宗教、文学、科学等各方面的了解，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特殊看法，不与人尽同，我们必须特

别细心谨慎地加以处理。有了以上这么多陈述上的基本困难，要想针对斯宾格勒的学说写一篇完整的论文，可以说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毋庸讳言，这是本文之作的天然限制。由于作者不是史学家，因此不能对斯宾格勒广为引用的史料作出真实或虚假的辨别；又由于作者不是某一个文化领域的专门研究工作者，所以作者也不准备针对斯宾格勒所论的某一题目作窄而深的研究；作者的兴趣毋宁集中到斯宾格勒历史哲学的一般论题上，为他这一番光幻奇特的历史哲学，寻觅出基本理论的架局来。为此，首先我们得弄明白：

(一) 究竟斯宾格勒思想线索有没有它潜在的一贯理路与统一的理论架局？

(二) 究竟斯宾格勒依据这样的线索所实现的理论架局是否可以成立？它在我们人类思想的进程中究竟表现了怎样的义蕴？

事实上对这两个基础问题的探讨，也正构成了作者本文理论研究的中心，从而划分出作者所谓的斯宾格勒历史形态学三义，由浅入深，一一加以简明的论述与阐释，厘定出它

①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一般表现手法，既不是严格地依照归纳的程序，总结出他的一般性结论，也不是在卷首预先提出一个完全的一般性理论框架，而后一步步引用证据，证实他的一般论题。他只是武断地首先假定了几个基本意念，然后用这样的意念去套另外的意念，同时即在写作的过程中，安排入了他所搜罗的丰富的历史经验证据，反复阐明他的这些中心论题。结果使斯宾格勒的这部书，尽管在基本意向上是明朗的，并且处处表现了他的光辉洞见与绝世才学，但是，在他的观念与观念之间缺乏确实而完整的联系，以致人们不能面面相觑看到他的学说的全貌，这不能不说是他写这部书的一个重大的缺陷。神龙三现的写法使他隐约地表现了一个连环，但他未曾解释明白这个连环，本文之作，就是抱着一个愿望，希望能够补救斯宾格勒的这个重大的缺陷。

们清朗明晰的理论效果来。

第二节 斯宾格勒论历史形态学 与自然形态学的区别^①

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蓝图，在《西方的没落》导论的第一节中，开宗明义，便给予了我们清楚明确的方向与线索，他说：

“在这书中，初次尝试作预先决定历史的冒险，溯及一个文化的命运尚未开展的各个阶段，尤其要溯及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星球的唯一文化，现在正在完成阶段的西方欧美文明的未开展的各个阶段”。

要想预言历史，这是一件多么不平凡的工作，斯宾格勒何以敢夸下这样的海口呢？这自然是由于他对历史有一套独特的看法与信念的缘故。于是，斯宾格勒继续追问道：

“是否有一套历史的逻辑呢？是否在一切偶然与不可计算的分立事件的元素之外，还有某种事物，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历史人性的形上架构呢？它在本质上独立于我们看得这样清晰的外在形式（包括社会、精神与政治各方面）以外。并且是否这些现实，实在只是次级的存在，是由它所导引出来的呢？……”

^① 本节所用材料大致集中于《西方的没落》第一卷第一章：导论（斯宾格勒对其自身学说的简单的解说）、第三章及第四章：世界史之问题，（一）观相与系统，（二）命运观念与因果原理，但却已经经过一番系统整理了，将原有散立的观念组织成为一个纵贯推演的严密结构系统，读者可进行参阅比较。

假定历史的确有这样一种逻辑存在的话，自然而然，只要我们能捕捉到它，我们便可以用来计算以及预言未来的历史了，问题是我们要凭借怎样的方法来捕捉这样一套特殊的历史逻辑呢？

斯宾格勒断然拒绝采用一般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问题。^①这是因为，尽管西方十八、十九世纪一些肤浅的思想家，要把当时流行的一套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的范围之内，但是历史题材与自然科学题材的差异，造成了这些学说必然行不通的命运。稍加分析，我们立刻可以辨别出，自然科学的对象乃是一些条件的因子，由它们可以推导出一些普遍的一般性的真理或结论，实验的设计可以重制出我们需要的一切情况。简单说来，科学所发现的真理是永恒的，它可以逃脱时间的羁绊。而在历史的探究中，情形则完全不同了。历史所对付的对象乃是一些在时间的长河中一去不返的单一发生的事件，我们无法将历史的情况重制出来。为了象自然科学一样只需运用严格的观察实验方法，立刻可以收获丰硕的结果，我们只能通过一种特殊的“类比”方法去厘定出历史的意义。于是，当我们要研究拿破仑一生的历史时，我们总不例外地要将拿破仑的丰功伟业，去和历史上的其他

① 斯宾格勒并不必然排斥在历史中运用接近科学方法的考证方法，但却作了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编年数”（Chronological number）与“数字数”（mathematical number）之间的分别，前者用来指示在历史中单一发生的事件，后者则用以标示一些恒常的可能性的数字条件关系。由此可见，即使其考证方法可以被当作一种科学方法，也至多只是一种半科学的方法而已。更何况历史的根本目的终极是为了发现史实的意义呢。这样看来，可断定考证并不是历史的主要工作，而只是它的一个先行的工具而已。这样简单而重要的观念自然应该首先加以清楚的区分与明辨。